

1901



(内部发行)

2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

目 录

- 陈毅同志在兴国 黄朝天 (1)
- ✓ 将军忆当年 周尊煥 (8)
- 崇贤农民暴动 李挺 (27)
- 打土豪分田地 李通胜 (35)
- 我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前后 张方毅 (43)
- ✓ 爱国的历史学家姚名达教授 肖根泉 (52)
- 中央造币厂亲历记 谢里仁 (66)
- 上社区消费合作社 李佐忠 (80)
- 上东区游击队 钟友倬 (91)
- 工农剧社兴国分社蓝衫团 刘传斋 (96)
- 日寇在均村的暴行 谢益赞等 (106)
- 回顾忧道小学 肖正清 (113)
- 谢寿如其人 吕阳 (122)

陈毅同志在兴国

黄朝天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陈毅同志常到我的家乡江西兴国一带从事革命活动，这里记叙的是他在兴国的几件往事。

“让敌人坐坐土飞机”

我参军的第二年，组织上调我给陈毅同志当警卫员，当时他是红二十二军的军长。

当了警卫员我才知道，首长往往比士兵更辛苦。陈毅同志每天不是行军打仗，就是参加各种会议，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。有空时，他总喜欢到处走走，作社会调查，了解和指导地方武装工作。

一次，我们来到古龙岗，房子刚号好，有位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的同志就找来了。他向陈毅同志提出，请部队支援一些弹药，并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理由。陈毅同志听了连连

摇头：“同志哥哎，你们向我伸手，我向谁伸手？我们还是去找蒋介石伸手嘛。”说着，陈毅同志指着不远处的一家鞭炮小作坊，又说：“你是捧着金碗要饭吃，古龙岗产硫磺，能造鞭炮，就不能造弹药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陈毅同志让我们警卫班找来了硫磺、土硝和木炭灰，亲自动手做了个炸药包。傍晚，他把区军事部的那位同志和赤卫队员们召集到河滩上，进行了一次爆破试验。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压在炸药包上的几块大石头被炸得粉碎，河滩上也被炸出个一米见方的大坑。围观的人们霎时沸腾起来，刚来时那种将信将疑的表情一扫而光。陈毅同志也乐了，笑着说：“大家看清爽（楚）没有？土法上马，效果不差。你们可以多做一些，让土铳、土炮吃个饱，再做点地雷、炸药包，让敌人坐坐土飞机。”

试爆的成功，大大调动了群众制造炸药的积极性。在陈毅同志的具体指导下，古龙岗家家户户都行动起来。人们换下墙上的老墙土熬土硝；上山砍柴烧木炭，再用石滚碾成灰；古龙岗自产硫磺，来源更是不成问题，第一批炸药、地雷很快造了出来。

时隔不久，敌人向我们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反革命“围剿”，古龙岗的赤卫队员和群众用这批炸药、地雷滞敌

行动，伺机打击敌人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。他们还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，武装了自己。

“同蒋介石斗智”

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战斗中，我因腹部受伤住进了设在小布的医院。出院以后，我听说陈毅同志已从红二十二军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于是，我找到了省军区机关，重新回到了老首长身边。

省机关人数不多，通常在一起行动的只有一、二十人，主要在兴国、于都一带活动。陈毅同志每次来兴国，不是去赤卫队、妇女会、儿童团检查工作，就是去走村串户，找老表们拉家常，作社会调查。有些老表听不懂四川话，他就让我这个“小老表”当翻译。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：“你们兴国是个好地方，你们兴国的群众了不起，你做个兴国人，光荣！”

一九三一年七月，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人马，自任总司令，气势汹汹地向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，陈毅同志更忙了。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，他以很大的精力抓了根据地内部的坚壁清野工作。七月下旬，他带领我们来到兴国，逐村挨户地检查和

指导坚壁清野工作。记得到江背洞时，他围着一个小村庄转了两圈，然后对村苏维埃的干部说：“你们光藏粮不行，还要断路。把大路小路都变变样，翻翻个，看他们上哪找粮去！”他又指示村干部：在小河小溪里放进染料，把水搅成五颜六色，使敌人不敢吃，不敢用；把锅碗瓢勺和门板铺草藏起来，使敌人做不成饭，睡不好觉……。在陈毅同志的启发下，村干部们也想出了不少新点子。陈毅同志笑着说：“对头！三个臭皮匠还凑个诸葛亮，你们把脑壳里的办法都拿出来，跟蒋介石比一比，看谁高明！”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我说：“老是藏粮呀、挖路呀，捞不到仗打，真没劲”。陈毅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这个小鬼，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们不也是在打大仗嘛，这些工作是我们反‘围剿’的第二战场。”他点燃一枝烟，猛吸了几口又说：“这次敌人来了三十万，是头大肥猪，我们一口吃不下它，放了又可惜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拖着它，把它从肥拖到瘦，从瘦拖到死。当年，有个欧洲人叫拿破仑，可了不得呀，率领大军一下子打到了莫斯科，但没想到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，没吃没喝的，部队一下子就垮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作‘窄路相逢勇者胜’，我看应该改一下，改作‘窄路相逢智者胜’。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同蒋介石斗智，让他也走拿破仑

的老路！”

正如陈毅同志所说的那样，敌人的主力部队果然“肥的拖瘦，瘦的拖死”无力再战了。九月初，嚣张一时的敌人灰溜溜地夹起尾巴逃跑了。

“没有群众就没有红军”

一九四三年冬，我在陕甘宁边区任三支队七团团长，受领了开赴河南前线抗日的光荣任务，在边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，我又见到了阔别十年的老首长陈毅同志。

陈毅同志当时任新四军军长，这次是回延安开会的。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，他同我谈了整整一天。那天，陈毅同志兴致很高，妙语横生，笑声不绝。他形象而又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大抗日战场的形势，勉励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。吃午饭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在长征后就没有回过兴国吧”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：“多少年了，我忘不了兴国的老表，忘不了老表们的青竹杠子（禾杠）啊！”我愣住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陈毅同志看我这副神情，又笑了起来。“对了，你还不晓得，是兴国老表救了我陈毅一命！”

原来，在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北上前夕，陈毅同志在战

斗中负了伤，由于流血过多，加上当时缺医少药，引起伤口溃烂，行动非常不便。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，陈毅同志带着一个警卫班，来到东村一带的大山上养伤，开始住在山门寨的天官庙附近，离我家只有几里山路。

随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节节失利，敌人很快就占领了兴国县城，并常常派兵到四乡骚扰，搜查红军伤员，捉拿农会干部，迫害红军家属，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纷纷窜了回来，变本加厉地残害工农群众，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，兴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领路人，他们仍然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坚持给陈毅同志他们送饭送药。

一次，两位送饭的表嫂在半路上被敌人发现了。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，两位大嫂始终认定是给上山砍柴的亲人送饭，没有露出一点风声，当乡亲们凑钱把她们赎回来时，两位表嫂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打那以后，敌人的盘查更紧了，乡亲们又想出了新的办法，他们把青竹杠子打通，装进煮好的饭菜以及盐巴、药品，然后利用上山打柴的机会，把这些青竹杠子丢在山门寨附近的山坡上，下山时，再砍根毛竹挑柴下山，既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盘查，又能保证食品不会被野兽吃掉，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到处悬赏捉拿的陈毅不仅没有被困死、饿死、病死，反而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初步养好了

伤，重新回到了部队，领导了永垂青史的三年赣南游击战争。

对往事的回忆，拨动了陈毅同志的心弦，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了，他语气深沉地对我说：“朝天，战争给我们留下的遗憾太多了，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可敬的老表们的姓名，他们是我们亲父母，亲兄弟啊！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权利忘记人民。没有群众就没有红军，就没有陈毅啊！”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南京

将 军 忆 当 年

周章煥

1978年的7月间，我们专程到兰州拜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肖华同志。将军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央军委委员、兰州军区第一政委、甘肃省委书记，工作十分繁忙，但仍然挤出四天时间（7月27日至30日）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当年苏区的革命历史。内容有将军自己的战斗经历，也有其他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；有兴国县的地方党史，也有中央苏区的光辉历史。内容丰富具体，情节生动感人。现将这次有意义的重要谈话择要整理出来，供广大青少年学习，从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。

一、从小立志革命

肖华同志是江西省兴国县城东街肖屋村人，家境贫寒，父亲三兄弟都是泥水工人出身。父亲肖能球，苏区时曾任城

区政府秘书、区委书记、县供销社主任等职。叔叔肖能岩是兴国县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（1930年3月）。母亲严招胜是城区妇委主任。他家所在的东街，码头工人多，党团骨干多，革命组织早，群众觉悟高，是兴国县城有名的革命地方。兴国县城早在1926年秋就建立了党团组织，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。1928年冬兴国暴动后，革命势力更加蓬勃发展。年幼的肖华同志就是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当时他正在县城六年制的赤墈小学读书，1928年高小毕业后入文澜阁的县立中学读了不到一年书就闹革命了。正如他自己回忆中所述：

我在小学读书时，正是大革命风暴席卷各地的时候。革命形势的影响，党组织的教育，使我从小就懂得要干革命。在赤墈小学读书时，有三个教员是共产党员，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，他们是：

肖以儒，赤墈小学校长，后来是兴国县委书记，1928年春病逝。

肖以佐，赤墈小学教员，大革命时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准尉司书，曾任25纵队政委，红二十军参谋长，1931年牺牲。

肖藻全，赤墈小学党义教员，经常给我们讲革命的三民主义，讲苏联十月革命，讲马列主义，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

道理，后来他因贪污案逃到浙江去了。

这三位小学时的教员，经常找我去个别谈话，派我去进行宣传活动，还经常组织我去听革命讲演。那时兴国县总工会每周都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，我每次都去听。特别是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的报告，我听了不少（当时总工会驻扎在东门口一个小作坊房子里，前面是城隍庙，不是驻在考棚内，考棚内驻扎的是青年干社，总工会门口还写了“劳工神圣”四个大字）。因此，我从小就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，立志要革命。记得赤墈小学高小毕业考试时，作文考试题是《未来的我》，不少同学说要干这干那，有的说要当官发财，我却说要为革命，结果考了个第一名。

二、兴国的武装暴动

1928年12月20日（农历十一月初九日），兴国县党组织以红二团和十五纵队为主力，举行了第一次武装暴动，进占了兴国县城，陈奇涵等老同志在延安时曾回忆说：“当时东街的团支部书记肖华同志和卓雄、谢象晃同志均参加了这一起义的领导。肖华同志在搜捕反动分子中是有力的向导，起了积极的作用”。为此，我们请肖华同志回忆当时的生动情景，他说：在这次武装暴动中，我主要担负了两大任务：一

是当向导，带领红军搜捕反动分子。暴动之前，我先到城外的榔武一带去把红军的便衣战士二十多人带进城；暴动开始后，我便带便衣队到肖屋村抓到了县警察局长肖正安（不是王老五）。那时县警察局驻扎在治平观上面的火官庙。肖正安原为国民党的营长，是一个反动透顶，作恶多端的家伙，他经常无故敲诈勒索农民的钱财，随意枪杀农民于观音阁前面的河边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。这次抓到后，在瑶岗脑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他。除此，我还用木炭在地主土豪家门口划“×”作记号，红军随后就捉他们，从而捕杀了好几个反动分子，使这一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。二是送信，搞联络工作。我当时年幼目标小，来往城乡之间谁都不会注意我，因此，党组织派我担任这项工作。我当时送的是药水信，有时还把字写在衣服上、手巾上，到目的地后，浸入清水中就能显示出来，利用这些办法及时地把党的决定传达 到城外去。有时，党组织还派我去县衙内看“过堂”，探听被审者是不是共产党或革命者，以便组织营救。

暴动前，兴国党组织还采用分化瓦解、暗示警告、软化斗志等策略，把许多地方的靖卫团争取过来为我所用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的一支四十余人的地方武装到龙口打土豪以后，故意绕道经过兴国县城返回东村，向敌人示威。当时，

城里械枪纷纷，有的反动派主张要打，我们就通过肖华传对靖卫团总钟纯斋的父亲钟岷山作了警告，于是钟岷山告诫其子“不能结怨太深”，钟纯斋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那支队伍在大白天里，大摇大摆地从李屋塘头经东街上，河边街、石灰市、武媚桥开往东村、莲塘。兴国的其他反动头子也就无可奈何。我亲自见到这支雄壮而威武的队伍在敌占区安全而顺利地通过，感到十分高兴，觉得他们都是不怕死，很勇敢的人。这次武装示威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，振奋了群众的革命斗志。

暴动队伍进占兴国县城后，还张贴散发了革命标语，释放了犯人，收缴了哥团枪支，发放了官仓积谷，分掉了当铺财物，焚烧了县衙门，……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。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人民，震惊了敌人，致使外逃的反动分子长期不敢返回兴国，县城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，造成了更有利的革命的形势。

三、兴 国 团 的 工 作

接着，肖华同志回忆说：我是1928年12月入团的。刚入团时就学了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共产国际》。我们入团后是在党内过生活，以后才分出来搞团的工作，才分党、

团支部。

1929年4月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兴国时，派了两个同志在兴国工作。李春华早来一点，胡炳田晚来一点，都是红四军前委派来的。李春华是红四军留下来的兴国县县委书记，后来在赣州被捕，死得很壮烈。胡炳田是红四军中的一个政治干部，留在兴国搞团的工作。他来后组织了一个临时团县委，是兴国县第一任团委书记，我任组织委员（当时十五岁），还有一个宣传委员朱定鸿，当时团县委就是那么几个人。我跟胡炳田经常下乡，曾去莲塘、东村一带建立团的组织。他经常给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兴国有个小娃娃，名字叫肖华”。我还跟红四军派来发动群众的一位指导员叫文武的去崇贤、城冈、白石一带发动群众，他是一个高中生，以后他回部队去了。良村、白石团支部都是我去组织的，我还参加了城冈区苏维埃代表大会，成立了城冈团支部。城冈、良村、白石等团支部归兴国县团东北特区委领导（党也有特区委），胡炳田在兴国只有三个月时间，把兴国团的工作整顿好后，就调赣南特委工作了。

1929年7月，肖国章接任团县委书记，我仍为组织委员，朱定鸿仍为宣传委员。那时，党组织曾想派我去赣州读书，做学运工作，后考虑到我家在兴国很红，不便隐蔽，才没有

去。

1929年12月肖国璋调于都当中心县委书记后，由我接任兴国的团县委书记。我是兴国县第三任团县委书记，当时才十六岁。

1930年7月，我调红四军前委分配工作，在前委一个月中，经常在毛泽东同志身边，跟他在一起吃饭，这是我第三次见毛泽东同志。这次是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从汀州向长沙途经兴国的。他问了我很多事情，给我的教育很大。一个月后，我被分配在红四军任军委青年委员，管全军的青年工作，第一次参加打樟树的战斗。那时，红四军军长是林彪，政委是罗荣桓。军下面有三个纵队，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。我离兴国后，接任兴国团县委书记的是原寻乌县的团县委书记曾觉非。

四、革命形势蓬勃发展

肖华同志继续回忆说：1929年4月中旬，毛泽东同志在潋江书院旁边的崇圣祠传达了“六大”精神，并在此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课，学员睡在崇圣祠前面平川中学新修的教学楼上。给我们讲课的还有红三纵队的党代表蔡协民同志。蔡是湖南人，跟我们讲得更多，生动有趣。训练班没有发什么教

材，只是讲话作报告。主要内容是讲发动群众，实行土地革命，扩大游击队与红军，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传达“六大”精神等。那时办训练班，不象现在有作息时间，有教材，有座位安排，而是随到随坐，室内也只有黑板，讲台及双人桌凳。参加训练班的对象，主要是兴国县各特区区委员、党团员、干部，共有四、五十人。我当时是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会，第一次听过这样的大报告，印象最深。为了保密，不公开身份，参加学习的学员是不随便出入潋江书院的。有时要出去都是从文昌宫与崇圣祠之间的小门出去，再登后山出围墙门经雨坛脑绕道上街的。

1930年3月，兴国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，主席肖能岩，地址在潋江书院。这是正式权力机构。这时，我已是兴国县团县委书记了，也驻在潋江书院中文昌宫的楼上。刚好，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兴国，也在潋江书院平川中学的图书馆内办公。那是一间四周布满书架，中间有长条桌，四面玻璃花格窗的明亮房间。他在这里找我谈话，了解了兴国青年团的组织状况，支部和团员数，少年儿童数……。还指导我如何发动广大青少年打土豪分田地，进行土地革命，进行武装训练，积极扩大红军，特别强调要注意团本身的教育与学习，发挥